

## 博士论文的抄袭现象应该引起重视

○ 俞兆平

(厦门大学 中文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博士论文的抄袭现象到了应该引起重视的时候了。近年来, 抄袭笔者论著的, 有白纸黑字为据的博士就有三名。若任凭此种恶习蔓延开来, 再过十年八年, 学界可能连一块净土都找不到了。

〔关键词〕博士论文; 抄袭;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近期, 我的博士生们在查阅资料时, 陆续发现这几年来, 国内有数位博士以专著形式正式出版的博士论文, 内中一些章节抄袭自本人的著作。有的抄袭性质相当恶劣, 接近照抄照录, 连文句都懒得更动, 其明目张胆、肆无忌惮的程度, 简直让人目瞪口呆, 无法置信。

由于我的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与思潮研究的系列论文, 最初是以单篇形式发表在各报刊杂志上, 直至 2006 年 10 月才汇集成《中国现代三大文学思潮》(下称《俞著》)一书, 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列入“猫头鹰丛书”出版, 而抄袭者们由我的单篇发表的论文所抄去的文句、段落, 结集出版比我还早。这样, 随着时间的推移, 时光的流逝, 最终在客观上会变成这样——我在抄袭他们! 出现这样黑白颠倒的惊人的一幕, 势必损害到我的声誉。而且, 这几位抄袭者现均成为高校(有的是著名高校)的教授、副教授, 有的是科研单位的副研究员。因而, 我的学生们力劝我不要再沉默了, 应发表声明, 否则今后连他们也会蒙上耻辱——成了抄袭者的弟子。刘文典先生像是说过: 文人要爱惜自己的羽毛。看来, 我也不能不顾及自己的清白了。

---

作者简介: 俞兆平, 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第一位是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魏红珊副研究员,其著作《郭沫若美学思想研究》(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2005 年版)第三章“郭沫若美学思想的理论来源”中,“二、康德美学”,“七、马克思主义美学”,这两部分百分之八十的文字抄袭自我发表于《厦门大学学报》上的有关创造社研究的三篇系列论文:《科学主义与郭沫若的文学选择》(《厦门大学学报》1999 年第 3 期)、《创造社与马克思主义美学》(《厦门大学学报》2000 年第 4 期)、《创造社与康德美学》(《厦门大学学报》2001 年第 4 期)。看来,魏红珊同志对我的研究是进行了跟踪式的关注,但在她的著作中却居然只字不提原作的出处与著者。

1 魏著第 123 页:同浪漫主义一样,按美学倾向来说,表现主义也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持批判态度,但二者又略有不同。浪漫主义在批判中呈现出一种柔性,表现出对过去的怀念,主张回归自然;而表现主义则在批判中呈现出一种刚性,表现出向前求索的突进,主张征服自然。表现主义主张最大限度地肯定生命本体,勇于与一切压抑生命的逆向力量相抗衡。(《郭沫若美学思想》)

俞著第 74 页:若按美学倾向来说,表现主义也是对科学、科技理性及其所促成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持警惕的态度。在这一点上,它接近于浪漫主义。但两者之间又有所不同,如果说浪漫主义在批判中呈示为一种柔性的,向后看的忆恋的话;那么,表现主义在批判中则呈示为一种刚性的,向前寻索的突进。因为表现主义要求最大限度地肯定生命本体,勇于与一切压抑生命的逆向力量相抗衡。(《厦门大学学报》1999 年第 3 期)

按:揭示出表现主义与浪漫主义二者之间“刚性”与“柔性”的微妙的区别,看似简单,实则不易,没有一定的理论积蓄,是难于得出此结论的。但魏红珊同志就这么轻而易举地窃为己有了。

2 魏著第 122 页:马克思主义美学还强调创作主体依存于所在的社会环境。马克思认为个人是社会的存在物。因此“人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马克思的创作主体社会性的原则得到郭沫若的认同。1926 年,郭沫若在《文艺家的觉悟》中指出:“一个人生活在世间上,只要他不是离群索居……那他的种种精神活动,无论如何是不能不受社会的影响的。”对创作主体社会性原则的遵循,使得郭沫若在提倡“自我表现”的创作主张时获得了更有力的理论支撑。(《郭沫若美学思想》)

俞著第 33 页: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要则除了意识形态受制于经济基础之外,另一项就是强调创作主体与所生存社会的一体化。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作为抽象物同个人对立起来。”……马克思强调的是社会与个人的统一。因而,他在《共产党宣言》中肯定:“人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

马克思的创作主体社会性的原则在创造社主要成员的文论中时时得以体

现。1926年,郭沫若在《文艺家的觉悟》中指出:“一个人生在世间上,只要他不是离群索居,不是如像鲁滨孙之飘流到无人的孤岛,那他的种种的精神活动,无论如何是不能不受社会的影响的。他的时代是怎么样,他的环境是怎么样,这在他的种种活动上,形成一些极重要的决定因素。”……对创作主体社会性原则的遵循,也使创造社的主要成员在提倡“自我表现”的创作主张时有了理论上的根据,从而能理直气壮地进行学术论争。(《厦门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按:以往学界对创造社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多局限于1928年左右从日本归来的冯乃超、李初梨、彭康、朱镜我等创造社“小兄弟”们的身上,是我首先详细地考察了20世纪20年代初创造社三元老——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及郑伯奇,在掌握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观念、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文艺的本质与功用、创作主体的社会性、资本主义与艺术的关系、艺术发展不平衡性等马克思主义美学基本问题上的状况。正因其开拓性的意义,《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1年第1期作了全文转摘。魏红珊同志却采取了割裂、抽取的方式,把一个丰富、严谨的命题搞得支离破碎、残缺不全。如果无法领会就别抄,以免糟蹋了别人的心血与成果。

3 魏著第92-93页:对于“五四”时期的中国,康德的这一观念无异于一帖对症的良药,引起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们强烈的共鸣。他们都希望从精神文化入手去改造社会现实,重塑国人灵魂、挽救民族危亡;鲁迅、郭沫若之弃医从文,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康德美的理想的吸引。可以说,借审美来陶冶民众心灵,重塑国人灵魂,提升道德境界,培养完美人格、完善人性,开发灵性,从而对国家民族进行脱胎换骨的疗救和改造,最终实现拯救中国,这成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首选的途径。(《郭沫若美学思想》)

俞著第52-53页:对于五四时期的中国现状来说,康德的这一观念无异于一帖对症的良药,引起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热切的关注。像蔡元培就把康德哲学、美学引向中国的现实社会,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口号,想通过美的教育来涵养、陶冶民众的心灵,使国人逐步由感性、低下的状态上升为道德、文化的人。这样,由高品位的个体构成的中国社会才能走向文明、走向完美。通过审美来完善人性,从而拯救中国,成为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首选的途径,像鲁迅、郭沫若之所以弃医从文,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康德这种陶冶民众心灵、拯救国人灵魂、提升社会文化、道德程度的美育思想的影响。也可以说,五四初期占主导优势的“艺术救国”之类的思潮实则源自康德的哲学、美学的思想体系。(《厦门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按:我的《创造社与康德美学》一文的抄袭者不止魏红珊一人,这也从另一侧向说明其原创性意义及学术上的价值。魏著“康德美学”(第89-95页)部分,百分之八十可以从该文中找到相对应的被抄袭、剽窃的文字,因而不必一一列出,以免浪费篇幅。其中关于康德美的理想是由二律背反的正反命题组成统一的论证,极为艰涩抽象,以及由此延伸到对郭沫若“貌似无用,然而有大用

存焉”艺术观念的论析,其中所耗费的心血与精力是相当大的。这些成果,却如此轻易地被他人窃走,谁都不会掉以轻心。

第二位是南京大学中文系张光芒教授,其《中国近现代启蒙文学思潮论》(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2 年版)第五章第二部分“成仿吾与康德哲学中的‘客观’”一节(第 244—251 页),百分之六十抄袭自我的《成仿吾的“客观”与创造社的“自我”》一文(《文艺报》1999 年 7 月 6 日“综合评论版”)。但他抄袭的手腕,颇为诡异,让你感到有点啼笑皆非。

因为他在该节的大部分篇幅中,洋洋自得、煞有其事地大谈成仿吾与康德美学的关系,仿佛这一切都是经他个人独立钻研而得到研究成果似的。但他又不像魏红珊同志那么大胆无畏、干脆利落地窃走,而是有点心虚,所以在本节快结束部分,忽然插入这么一段话:“有论者所指出,从郭沫若到郑伯奇再到成仿吾,他们对艺术创造的出发点——‘内心’、‘自我’、‘客观’等的表述、追寻及界定,走过了一条从个体体验到理性概括,从概念的不确定性到概念的明晰确定性的路程……”然后在该页的页下注明我就是这一论者:“参见俞兆平:《成仿吾的‘客观’与创造社的‘自我’》《文艺报》1999 年 7 月 6 日。该文对创造社‘客观’理论的哲学内涵作了精辟的论述,不过该文作者认为这种审美认识符合辩证唯物论的原则,对此笔者持有异议。因为成仿吾这时尚未完全建立起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其关于美学思想的探讨从哲学本体论上说更接近于客观唯心主义范畴。”(第 251 页)他玩的这么一手,的确有点高明。一方面,说明他有注出你的文章,像是在遵守学术规范;另一方面,又说明你的文章是有错误的,我以上所研究的是对你的更正,不是抄你的。这正像一名小偷,偷了你的东西之后,还要说你的东西是次品,不值得偷。

他这样做的后果,对我来说是相当严重的。对于不明真相的读者来说,他不可能再去查阅、对照近十年前的一张旧报纸,这样,不但我的有关的研究成果被他堂而皇之地窃取去了,而且还给人留下这种印象——张光芒纠正了俞兆平在研究中的错误。如此,是非倒置、扭直作曲的荒唐的一幕就转化为真实了。

有偷没偷,当然也还是要用文字对照来证实。因为要留点篇幅对他的“异议”进行辨析,予以反批评,现暂举两段。

1. 张著第 244—245 页:显然,成仿吾的“客观”已经不是通常意义上所讲的那种不依赖于人的意识、独立于自我之外的物质性的存在,而正是康德哲学中特定的客观。康德在其著名的《纯粹理性批判》中将客观界定为一种“对象意识”,即是指在人的意识中所建立起来的对象。由于对象意识的建立需经过从“直观中把握的综合”到“想象中再造的综合”再到“概念中认知的综合”三个由低级到高级相互联系的复杂过程,因而它具有客观的秩序和统一性。这种对象意识不但不同于与“自我”相独立的物质存在,而且也不同于主体,因为它既不只是存在于表象中,也不只是在人的意识中,而却对“所有人均有效(可传达的)”。由于它内含着对所有人都有效的普遍必然的判断,亦即内含着与对象相一致的

客观性,因而康德称之为“客观的”。与此相对应,只对个体有效的判断则被视为是主观的。(《中国近现代启蒙文学思潮论》)

原著,“综合评论版”:也就是说,成仿吾的客观,不是通常所说的那种不依赖于人的意识、独立于自我之外的物质性的存在,而是康德哲学中特定的客观。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有一重要的概念——对象意识,它指在意识中所建立起来的对象,具有一种客观的秩序和统一性。对象意识的建立需经三个阶段:一是“直观中把握的综合”,即人的感知面对杂多的感性表象有一种心灵的主动综合统一;二是“想象中再造的综合”,即由想象使保存在记忆中的表象再现,并与另一个表象衔接统一起来;三是“概念中认知的综合”,即由一种概念同一性的引导,把想象所唤起的表象,与当下知觉表象系列联结综合起来。康德认为,经此三个阶段建立起来的对象意识“不同于主体”,“因为它既不在表象中,也不只在意识中,却对所有人均有效(可传达的)”。由于它内含着对所有人都有效的普遍必然的判断,亦即内含着与对象相一致的客观性,因此,康德认为是客观的。与它相应,只对个体有效的判断,康德则认为是主观的。(《文艺报》)

按:张文除了把我关于对象意识三个阶段的具体解释那三句话删除掉以外,其它文字几乎完全一样。更不应该的是,他把康德的两句话“因为它既不在表象中,也不在意识中”,从引号中抽出来,变成他的话,居然抄到了康德的头上去了。而我所做出最后两行的判断,张光芒同志可能是想改也改不了的。

2 张著第 245 页:他所孜孜以求的这种原理抑或真理便包含在上述“客观的”思想原理中,因为所谓“客观”实质上就是一种对象意识,一种意识中的“客观”。其特点在于既内含着认知对象的普遍必然性,即一种规律性或本质性,又包含着认知主体的概念式的知性判断,也即“悟性的统一”,乃至价值判断上的合理性、真理性。(《中国近现代启蒙文学思潮论》)

原著,“综合评论版”:由此可见,成仿吾及其创造社同仁所理解、所认同的客观,是一种对象意识,一种意识中的“客观”。它的特点在于既内含着认知对象的普遍必然性,即一种规律性或本质性;又包含着认知主体的概念式的知性判断,或悟性的统一,乃至价值判断方面的相对真理性。(《文艺报》)

按:这几行硬梆梆、全是骨头的纯抽象的语言,张光芒同志怕是掰不动了吧,只好照抄。但令人捧腹的是,为着回避一味抄袭之嫌,他在以上这段话的后面,紧接着加上一段不知从哪里引来的东西:“表现在美学领域就意味着必须抛弃‘只对于个人是真,不能适用于别人’的审美判断,力求在审美对象与审美主体的交融碰撞中取得逻辑上的乃至形而上层次的统一性,做出超个人的具有‘普遍妥当性’的审美评判,对他来说,所谓‘客观的’不外是普遍妥当性的别称,它是‘批评的生命’。郁达夫也强调说,‘不合逻辑的文学,终于不是伟大的文学’……”。从纯哲学性的“对象意识”与“客观”的论析,竟莫名其妙地转接到文学的“审美评判”、“批评的生命”上去,转到郁达夫论“不合逻辑的文学”上去,如此行文才真是“不合逻辑”,一派牛头不对马嘴的混搅。

3 对张光芒同志“异议”的回答:我在《成仿吾的“客观”与创造社的“自我”》一文的结尾写道:“当‘自我’(或内心、‘客观’)沟通、含蕴了世界与主体这两极时,当艺术把‘自我’这一由生命体验在‘社会中其所怀的情感’表现出来时,你能说这种审美认识论违背了辩证唯物论的原则吗?”当时的出发点是为着反驳学界流行的把创造社文学观念定性为“为艺术而艺术”的独断论,为创造社同仁所极力倡导的“自我表现”正名,而且仅是一反问句而已。张光芒同志却抓住这一枝节做起文章来,指责说:“成仿吾这时尚未完全建立起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其关于美学思想的探讨从哲学本体论上说更接近于客观唯心主义范畴。”我上述反问式的判断,决非空穴来风,如前所述,我做过《马克思主义与创造社》的研究,掌握了一些第一手资料。现略举二例,便可说明问题。

1924年 8月,郭沫若在给成仿吾的信中谈到:“科学的社会主义所告诉我们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时代,我相信终久能够到来;‘个人之自由发展为万人自由发展之条件的一个共同体’,我相信是可以成立的。”他所引的这两句话一是出自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一是出自《共产党宣言》均为共产主义的最根本原则。前者是关于人们在理想的社会中,物质生产劳动的形式和物质产品的分配原则;后者按恩格斯晚年对意大利社会党人卡内帕提问的回答,是未来社会主义新纪元的最基本思想的概括。郭沫若一下就准确扼要地抓住了共产主义的两大基本原则,可以看出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有一定研究的;而作为与郭沫若对话的另一方、号称创造社中首席理论家的成仿吾应该不至于比郭还不如吧。这说明郭沫若和成仿吾相当早就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并进行过一定深度的研究。

而后,成仿吾在其著名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一文中写道:“历史的发展必然地取辩证法的方法。因为经济的基础的变动,人类生活样式及一切的意识形态皆随而变革,结果是旧的生活样式及意识形态等皆被扬弃,而新的出现。”意识形态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动而变革,马克思、恩格斯这一最为闪光的思想,成了成仿吾考察文学艺术流变的指导原则,这难道不是唯物辩证法吗?还能是其它什么呢?什么“客观唯心主义”,求求张光芒同志,别给前辈乱戴帽子了,回去认真真读点书,掌握点第一手资料,再来下判断好吗?

第三位是中原地区一所著名大学中文系的一名副教授,其已作为专著正式出版的博士论文,其中有八处抄袭了我的论文《中国现代文学中古典主义思潮的历史定位》(《文艺研究》2004年第 6期)和专著《现代性与五四文学思潮》(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2年 5月版)。但由于他已来信向我做了沉痛的检讨,我答应不追究了,所以这里不具体点明。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我并不是个“大腕”,居然就撞上了三个博士来抄袭、剽窃我的东西。这一现象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若任凭此种恶习蔓延开来,再过十年八年,学界可能连一块净土都找不到了。

〔责任编辑:力 昭〕